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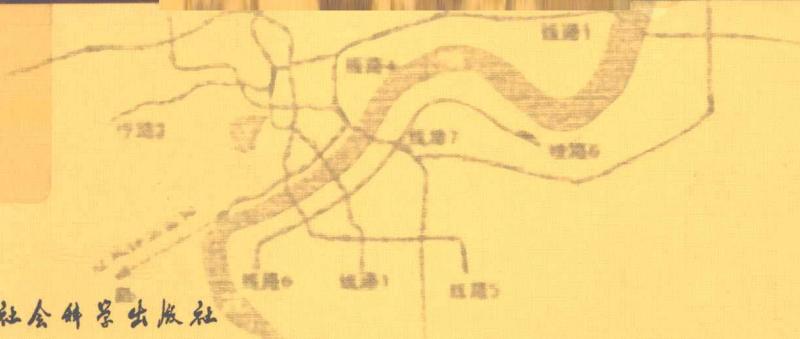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

民国时期浙江户政与人口调查

MINGUO SHIQI ZHEJIANG HUZHENG YU RENKOU DIAOCHA

夏卫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宋元时期江户县与人口管理

——以江户幕府的户籍制度和人口控制为研究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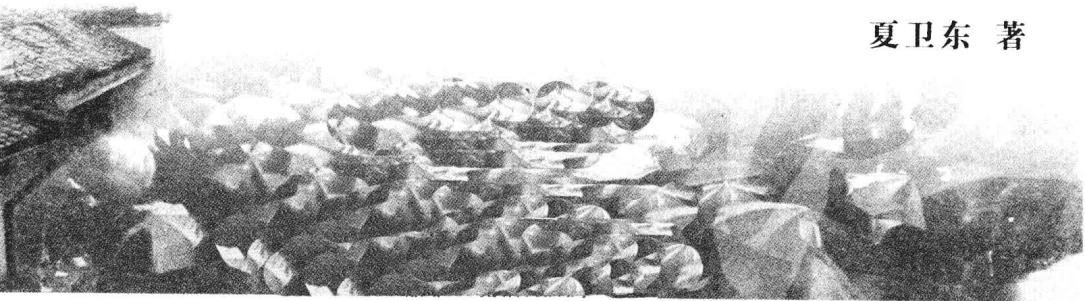
◎ 陈晓云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

民国时期浙江户政与人口调查

夏卫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时期浙江户政与人口调查 / 夏卫东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4

(民国浙江史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004 - 9660 - 1

I. ①民… II. ①夏… III. ①户籍 - 调查 - 浙江省 - 民国
②人口调查 - 浙江省 - 民国 IV. ①C924. 255. 5②D693. 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4512 号

责任编辑 宫京蕾 周慧敏

责任校对 李 莉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设计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65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指导委员会

主任：赵洪祝

副主任：夏宝龙 王国平 巴音朝鲁 李 强

黄坤明 郑继伟 张 曦

成员：胡庆国 马林云 陈一新 胡 坚

金兴盛 刘希平 钱巨炎 乐益民

杨建新 钟桂松 陈 荣 林吕建

郑仓元 童 健 胡祖光 梅新林

许 江 邵占维 张金如 陈德荣

孙文友 徐止平 孙建国 梁黎明

张鸿铭 陈荣高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

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入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

浙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早早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源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和良渚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们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和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液中，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的众多杰出人物身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因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从钱氏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到方孝孺、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殉国；从沈括的博学多

识、精研深究，到竺可桢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亮、叶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王阳明的批判、自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等，都展示了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创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渊源有自的浙江地域文化传统和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浙江的生命力、催生着浙江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的竞争力，激励着浙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停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地超越自我、创业奋进。

悠久深厚、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相伴随的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机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文化要素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浙江的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同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

府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年7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力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省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和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发展。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古、人、文”四个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板块，开展系统研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掘浙江文化底蕴，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构、变化规律和地域特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围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点研究基地建设、加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希望通过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

育浙江人民、用浙江文化熏陶浙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浙江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浙江人民的无穷智慧和伟大创造能力，推动浙江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今天，我们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流，受着一方百姓的期许，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们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创造生生不息。

2006年5月30日于杭州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赵洪祝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

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已设立 10 余个系列 400 余项研究课题，完成 230 项课题研究，出版 200 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新创业的重要支撑。2008 年 6 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

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响。

前　　言

人口、领土、主权是一个国家的三大要素。人口是庶政之本，国家在推行各项政策时，必然会考虑到其人口因素。中国自先秦时期开始，就非常重视人口数量的统计和户籍的编审。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出于争霸的需要，都极力发展本国人口，招徕他国人口。管仲相齐，将齐国各地按户口多寡划分行政区域，并实行“军民合一”的政策，即所谓的“叁其国而五其鄙”。商鞅变法时，创设了算赋（人头税），将人口数与国家赋税联系起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封建国家都极为重视户籍的编审，这关系到国家的财政收入问题。同时，对一些州县的地位的界定上，也往往参考当地户口数；政府内部都设立了掌管全国户籍的机构和官员。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雍正二年（1724年）的“摊丁入亩”政策，改变了过去的“丁随丁走”、“地随丁走”的征收模式，形成了“丁随地走”的新局面。这一变革，同时也降低了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不过，这就意味着人口数与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并无直接联系，国家对人口控制的必要性也大为降低。由此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各级官员对户口编审的积极性下降，导致人口数难以反映真实情况；二是以前为了少交赋税，各地或多或少都有瞒报、漏报的现象出现，而此后各级官员为了粉饰太平，人口大多为虚报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以后，就连保

甲制也予以废除。清末为了推行新政，在宣统年间进行了人口调查，由于已近清政府倾覆，其各地数据亦为参差不齐。就是同一省内，其数据也不完整。浙江省至宣统三年（1911年）第三次上报时，只有69厅、州、县上报户数，而报口数的更是只有54个厅、州、县。

民国成立以后，北京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对全国人口数再次进行调查。当时全国时局动荡，许多地区未在中央政府控制之内，其户口数更是难以统计。现存的较为完整的浙江省的户口数据为民国五年（1916年）、民国八年（1919年），其中以《内务统计》所载的民国五年数据最为完整，涉及户数、分年龄段的男女口数、职业情况、疾病情况、死亡情况等。《内务统计》还将民国五年的数据与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四年（1915年）的数据进行了对比。民国八年的数据主要保存在《土地和人口》“浙江部”之中，但与《内务统计》相比，过于简单。北京政府时期的其他年份的浙江人口数只沿继到民国十年（1921年）左右，且只有总数，并无县人口。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也对全国的人口数进行统计。这一段时间，浙江省颁布的户口查计法令也是最多的。保留较为完整的浙江省的人口数为民国十七年（1928年），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共15年的人口数，其中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数据最为详细。但这些数据与民国五年的数据相比，内容上还是过于简单。南京政府时期，浙江人口数据除了内容设计简单以外，还有一个问题，即在抗战期间，浙江的人口数据可靠性存在很大的偏差。抗战期间，浙江有一半以上的县份曾沦于日

伪统治之下，对于沦陷区的人口数，当时浙江省在统计时，往往借用抗战前一年或其他相近年份的数据加以填写。例如，杭州市于1938年沦陷，在浙江省民政厅所造的户口册中，杭州市在1938年至1945年的7年间，人口数均为606136人，直至1946年突然下降至367802人，人口数减少了20多万。这样，就造成战时浙江人口数据的可靠性下降。

此外，在浙江省的各种人口数据中，细目数据与汇总数据常常存在偏差，甚至是很大的误差，例如：民国五年时，浙江汇总人口数为22690494人；民国四年时，浙江汇总人口数为22471812人；民国五年比民国四年浙江省多增加了218682人。不过，如以细目数据计算的话，民国五年应为21690514人，民国四年为22471812人，则民国五年不但没有比民国四年多增加人口，反而减少了781298人。这种人口数据偏差的问题，在整个民国时期非常普遍。根据浙江省上交内政部的档案显示，1939年浙江当时人口数为21818657人，而据浙江省民政厅档案所显示当时则为21018657人，后者少80万人口。

为了获取中国的真实人口数，民国时期不少学者曾作了许多努力，大多采用回溯法或估算法进行。例如，言心哲的《中国乡村人口问题之分析》（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王士达的《近代中国人口的估计》（《社会科学杂志》1931年第2卷第1期）、陈彩章的《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等。他们或根据某一方法算出当地的平均增长率，再以特定年份人数为基准，算出另外几年的人口数；抑或根据某些区域的人口密度，加上若干权重以后，乘以经修正过的特定区域的面积，得出当地的人口总数。

陈正谟在其《中国户口统计之研究》一文中，曾对当时中国的人口数作过估算，“就民国以来各省区之调查及其历年

来之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加以估计，全国为四万八千七百十四万二千余人”。其中，河北、安徽、辽宁系各省查报之数，江苏、浙江、湖南、山西、陕西、绥远、察哈尔、新疆系根据1928年查报之估计数，蒙古系根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蒙古比丁的估计数，青海与西藏根据光绪二十八年西藏、青海人口与当时之面积估计数，而西康则又根据川藏两地的人口密度估计的。但是，陈正谟对其具体采用的估算方法及演算过程，却并未在文中加以说明，他自己也说：“估计方法未曾详述于文中，自是藏拙之用意，然此种估计之近真，虽无确凿之证据，亦无确凿之否证。”不过，他还是感叹获取中国人口数据的难度：“窃以为中国人口究有若干之问题，在未经政府及多数人民郑重其事地举行一次全国定期的大调查之时，任何人讨论之，其结果必与此比喻相去不远，其根基皆植于沙漠之上，经不起科学方法之批评也。人口原是社会现象之一，中国之社会现象竟变成类似于玄学之问题，吾国人不能不惭愧无地。”^①

现代有学者认为民国时期的人口数如果按分县、分省进行资料搜集的话，可以加以还原。但以浙江省而言，省一级公布的数据如上所述，已存在较大的偏差，而县一级的原始数据却难以发现，只有若干县的某一年份的部分数据尚有保留，绝大多数县份的数据已无从查起。

有鉴于此，本书侧重于当时的统计制度及统计结果，尽量反映民国时期整个浙江的人口查计情况。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章为《绪论》，叙述历代户政体系的概况及浙江省在

^① 陈正漠：《中国户口统计之调查》，第9—16页。载《统计日报》，时间不明。